

#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列 宁斯大林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YANJIU

3  
200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研究

## 目 录

### 新文献

- 列宁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 ..... (1)  
斯大林 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  
会议上的讲话 ..... (12)

### 经典著作考证研究

- 《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篇手稿的留传过程  
及其首次以原文发表的情况 ..... 英·陶伯特(31)

### 理论探讨

- 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理论 ..... 迈·福曼(57)  
新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的趋同模式 ..... 米·伊戈尔金(80)  
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问题 ..... 尤·布尔金(92)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各种关于理想  
社会的理论 ..... 刘彦章(103)  
争取政权斗争中的工具问题 ..... 纳扎洛夫(120)

### 史料研究

-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 ..... (127)

米·巴·托姆斯基 1921 年致列宁的两封信	(134)
关于《新莱茵报》的创办史	
新文献和史料	弗·梅利斯(154)
“美国报刊界提出的一个有趣的建议”	
——1922 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来往信件	(237)

## 人物与事件

俄国工会早期领导人——米·巴·托姆斯基	
..... 伊·谢·库利科娃、波·雅·哈扎诺夫(242)	
斯大林年谱(续完)	高晓惠(258)

弗·伊·列宁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  
(1922年11月20日)

编者按：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是他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第263号发表了关于列宁这次讲话的报道。这一报道已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4—302页)。下面发表的是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保存的列宁这次讲话的速记记录(第2全宗，第1目录，第23478卷宗)。这一速记记录与《真理报》的报道虽然并无实质性的重大差异，但不同之处较多，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把两个文本中差异之处用不同方式表示：方括号中的文字是《真理报》报道中原有的，黑体字是速记记录中的内容。讲话的分段和标点符号按速记记录排印。

同志们！我很遗憾，也很抱歉，没有能够更早地出席你们的会议。据我所知，几个星期以前你们就准备给我安排一次访问莫斯科苏维埃的机会。我没有来成，因为我自从去年12月生病以后，用专业的语言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严重丧失了工作能力，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不得不把这次[讲话]会议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我还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工作——你们都还记得，这部分工作起初加在瞿鲁巴同志身上，后来加在李可夫同志身上——再加在加米涅夫同志身上。用一个我曾用过的比喻，应当说，是突然要加米涅夫同志拉两辆车。尽管——还用

这个比喻——应当说，这是一匹非常能干的负重耐劳的马（鼓掌），但是毕竟不太该拉两辆车，所以我现在急切地等待瞿鲁巴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回来，我们好把工作分配得稍微合理一点。现在加米涅夫同志负担的工作太不合理。由于工作能力减退，我了解工作情况用的时间要比我打算用的时间多得多。

1921年12月我不得不完全停止工作，那已经是年底了。那时我们正实行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就发现，这一转变虽然从1921年初就已开始，但是[是]这一转变相当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实行这一转变已经不止一年半了，好像应该到时候了，大多数人应该按照新的情况，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转到新的岗位并各就其位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的变动最少。在这方面我们继续执行从前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你们说，我们始终不渝地执行这个方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关于这一点[用不着]还得向你们作详细报告：[因为]攻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接着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几天前大家在报上看到的国家联邦宣言，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作任何改变。我们站在一条非常明确地划定的道路上，从而在世界各国面前保证自己取得了成功，尽管这些国家非常仇视我们，尽管其中有几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想声明不愿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但是早就开始向以下方向变动：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应该建立起来，而且一定会建立起来。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国后面的危险，也许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会有陷于不利地位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而且不只是从报刊上看到。但是我想，[同志们]你们大多数人根据国外旅行得来的印象，也会相信发生的变化是多么

大。用一个旧的比喻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并没有换过车，既没有换过火车，也没有换过马车。

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我们在 1921 年春换过一次车。这次换车是我们为压力极大的能说服人的情势所迫使的，因此我们之间对这次换车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和意见分歧。但是这次换车还在继续给我们带来某些困难，要我说，是带来很大的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转变]换车是否必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们怀疑试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在[我们]党内或在广大的非党工农群众中间，对这一点都没有任何怀疑。

就这一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在于我们面临的任务需要经常解决新课题和吸收新人，需要实行非常措施和非常办法才能完成。我们这里还有人怀疑某种做法是否正确，在某一方面也还会有改变，所以必须指出，这两种情况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我们着手实行的制度是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解决各种经济问题，而在方方面面的生活中应该十分肯定地提出这些问题来。同样应该十分肯定地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们作出肯定的姿态，肯定的行动。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重整队伍、适应情况、重新组织，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但应提出问题来，使我们的行动变成法国俗语所说的“一跳”<sup>①</sup>。为了恰当地进行所有

---

① 记录如此。——译者注

这些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应当像俗语所说的，不是量十次而是量百次。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克服我们在解决一切任务和问题中所遇到的难以置信的困难。你们都很清楚，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你们都知道，国内战争拖了多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攻克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占领]在这里和那里为取得的成果作出了多大的努力。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联邦。这种[众望]努力使我们得以粉碎国内敌人，击退向我们进攻的[国外]敌人。这里我说的是日本。在已经形成的潮流影响下出现了一个确定的局面，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个十分确定的外交局面，这就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外交局面。这一点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成果，但是，为此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我们已经使敌人承认了我们的权利和我们[不论]在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上[都使敌人承认了我们的权利]取得的一切。贸易协定的签订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当我们完成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说，为什么我们，在一年半以前[我们]就走上了[了]这条所谓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的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这条道路]在这一经济政策的道路上会这样步履维艰，这一经济政策没有向后转，但转向[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条件：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完全脱离了常轨，经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现在[不得不]正开始从极小极小的百分比，即战前的百分比来[开始]计算一切。[我们用这个尺度来]我现在使用一贯使用的尺度，用于衡量我们[的]现实情况的尺度时[这样]有时[就]非常焦急烦躁，总以为这里的困难太大了。如果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跟普通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相比，那任务就显得更大了。我们提出这个任务，

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必指望得到富国的援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得到这种援助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通常叫作受援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承担的非常之高的所谓利息，那就更不指望这种援助了。这实际上同援助相去甚远。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应该起一个远不如“援助”这样好听的名称才是。但是，连这种普通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国内战争之后，我们差不多处在被抵制的状态，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同你们保持我们习惯保持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是正常的经济联系。”

从我们[走上]实行新经济政策[道路]算起已过去一年半还多了，从我们签订第一个国际条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对我们实质上的抵制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表现出来。当我们进入新的经济环境时，我们不能有什么别的指望，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必须转变，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资本主义强国所能给我们的和将要给我们的任何援助，不但不能使这种情况消失，而且大概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加深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这一点是愈来愈清楚了。“单独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单独干吧”——几乎每一个同我们做过某种交易、订立过某种合同或者开始某种谈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我们这样说。特殊的困难也就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这[种]些困难。我们用三年多异常艰苦、异常英勇的工作，通过破坏国家生活通常进程的一切特征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为的是证明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摧毁国际生活这一旧的进程，并且已经加以摧毁。在我们迄今所处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工夫考虑我们是不是破坏得过多了，也没有工夫考虑牺牲[会不会]是否太大，因为牺牲已经够大了，因为那时开始的斗争（你们都很清楚，这一点用不着多讲了）是一场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殊死

斗争，我们反对这种旧制度，为的是争取生存与和平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我们已经争得了。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也不是有可能被指责为偏护我们的证人的证词]也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与我们敌对的证人的愿望。不，这是我们的敌人营垒中的证人的证词；他们当然有所偏护，只不过不是偏护我[方]们，而是完全偏护另一方。这些证人在邓尼金营垒中呆过；[当过占领区的首领]曾率军攻占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知道，他们的偏护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到了很多破坏。由于他们，我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各种各样宝贵的东西，而最宝贵的是无数人的生命。现在，我们要十分用心地认清我们的任务，要了解[当前的]主要[任务]的困难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既得的成就。[任何一个既得的成就]我们[都]决不放弃。（鼓掌）同时这些任务中有一项是[我们面临着]崭新的[任务]，完成它不需要旧任务，甚至旧任务[旧东西]会成为直接的障碍。这个任务[是]最[难弄明白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弄明白并且必须完成，我们在一切都基于否定旧事物的条件下生活了三、四、五年（我们不久前刚庆祝革命五周年），对这一点最难理解。现在我们已经否定了旧事物，我们必须在崭新的环境中，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环境中学会用新的方式工作，我们必须学会工作，学会千方百计去工作。[以便在需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时学会如何工作]。同志们，我想，这些话和这些所谓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很能理解，因[为]此在我病休的将近一年中，你们[在处理自己手中的工作时实际上已从不同的角度，在千百种场合谈论过和思考过这个问题]目标明确地从不同方面千方百计地进行工作，明知这里和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不得不经常实际地谈论这些问题，我以为，你们不得不更经常地思考这些问题，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只能使你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我们

需要有比以前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灵活性。

旧东西我们不应该拒绝。我们迁就资本主义强国而作的许多让步，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同时，我们只从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中让出不大的一部分]，保证它们的习惯，不改变它们的习惯，同时让那些几乎掌握全部生产资料或最大生产资料财富的国家有可能把这些生产资料让出不大的一部分，这就能保证我们有赢利，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都会从中感到有好处。<sup>①</sup>

最近报上讨论了英国人厄克特提出的租让问题，他在国内战争中差不多一直是反对我们的。他曾说过：“我们要在对付俄国，对付那个竟敢如此这般剥夺我们的俄国的国内战争中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还得同他交往。我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我们非常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我们告诉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已经争得的东西决不会交回。我们俄国是这样辽阔，经济潜力又是这样雄厚，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不拒绝你们盛情的建议，但是我们要[像实业家]像冷静的务实的人那样[冷静地]来讨论你们的建议。”诚然，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不成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同意他们的建议。我们不得不拒绝他们。只要英国人不承认我们可以参与讨论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拒绝，但是我们在拒绝后必须立即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这对我们是否有利，签订这种租让合同对我们[是否]有利，如果有利，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讲一讲]讨论一下价钱，讨论我们能否拒绝这一建议，也许我们不应加以拒绝，这一建议对我们来说甚至是必要的。

---

① 记录如此。——译者注

同志们，这就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们处理问题现在应该和过去不同。从前一个共产党人说：“我要献出生命”，他觉得这很简单，虽然往往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应当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敌人当然是要讨价还价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是为了占我们的便宜。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决不会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会变成羔羊，而且会白白给我们各种好处。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们也不盼望有这种事，我们指望的是，我们这些习惯于回击的人，[在这里既然摆脱了困境，就要有本领]我们转到旧的生活基础上去后能千方百计掌握做生意[，有本领]和赚钱的本领，[有本领摆脱困难的经济状况]掌握不靠任何结盟摆脱经济困境的本领。这是个很困难的任务。我们正在致力于这个任务。我希望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旧任务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大。不管这个距离多么大，但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学会了巧妙周旋，而且应当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和正进行的周旋是最困难的一次，不过看来，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我们要在这里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要证明我们不是只会死背昨天学到的东西和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对不起，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学习，要学到能够取得毫无疑义的、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重新学习，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再一次相互坚决保证：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克拉辛同志同厄克特这位整个武装干涉的头头和支柱多次谈过话，他说，[厄克特]这位整个武装干涉的头头和支柱过去作过种种尝试，无论如

何要强迫我们在全俄恢复旧制度，现在却同[他]克拉辛坐下来一起谈判，并且开口就问：“什么价钱？多少？订多少年？”（鼓掌）这离签订一系列租让合同，进而建立十分严格的、牢靠的（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合同关系还很远（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快要走到了，可是还没有走到。同志们，应当[肯定]指出这一点，[不过也不要]使我们不至于骄傲。我们还远没有完全做到使自己成为强者，能独立自主，能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资本主义的交易，不管这种交易多么难，我们也能做成，也能弄清它的实质并予以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已开始的]还没有做到的破除工作，无论政治[工作]方面的或党的[工作]方面的，都必须继续做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旧的方法，改用崭新的方法。因此需要我们的旧机关工作人员，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是旧的，因为那些职员吓唬我们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决不上你们那儿去，于是我们说：“请吧！”他们全都重又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成了傻瓜。这句话很粗俗，但这里却恰如其分。

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共产党员正确地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这一点用不着隐瞒，应该坦率地说出来。

这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面临的任务和我们面临的困难，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这不应是一种愿望，一句口号，而应是完成十分实际的条款，我们应当开始这样做，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应当掌握这一方向，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这一道路，并且说：“是

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们的党同全国人口比起来，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它把这个任务担负起来了。]

担负起这个任务的自称为党的人人数很少。他们应该说，对出于纯粹党的目标和条件完成这一生死攸关的党的任务来说，这个党只是整个俄罗斯劳动群众中小小的核心。这个小小的核心给自己提出了改造一切的任务，它[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已经改造了。这不是空想，而是人们最关切的事业，我们已经证明并做到了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做到。改造工作要做得让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夸，而是我们夸你们，我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有了这个成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决不会想回到旧制度去了。”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昨天学会的任何一个口号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人说这一点，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必须适应这个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些消极面不用列举，你们都很清楚。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使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们可以与共产党员做交易，可以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尽可能多地挣钱。[我国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不会办事情呢？这还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党报上每天都有十来篇文章写道：某个工厂、某个工厂主的租赁条件如何如何，而在我们共产党员同志当厂长的地方条件又如何如何。这是否有利？是否合算？我们已抓住日常问题的核心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说到

圣像，我们仍持原来那种否定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长时间热烈鼓掌）】

速记记录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  
究中心，第 2 全宗，第 1 目  
录，第 23478 卷宗。

（何宏江译 责任编辑：李京洲）

约·维·斯大林

## 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莫斯科,1927年4月5日

原编者按:下面刊登的斯大林1927年4月5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系第一次发表,它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讲话十分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斯大林当时对于中国1925—1927年革命最后阶段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性质、动力和前途,国民党的成分和性质,当时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国民党内各个派别间的斗争,莫斯科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为了推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而控制和利用国民党内的进程的可能性。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围绕上述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第二,斯大林的这篇讲话和列·达·托洛茨基与格·叶·季诺维也夫为了反对派的利益而利用这篇演说进行的清算,在1927年4月开始的又一轮(也是最后一轮)联共(布)内部反对派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的斗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众所周知,在斗争的这一阶段,关于1927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失败(当时认为是中国革命的失败)的原因问题,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斯大林和布哈林个人应对这场失败负责的问题,在反对派领袖的言论中占据中心位置。

联共(布)积极分子会议是在1927年4月4—5日,即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起义的联合力量和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队3月下旬初占领中国

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两周之后召开的。

这一事件在联共(布)内部引起广泛反响。中国的局势、今后革命发展的前途，围绕这些问题在党内，在共产国际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中进行的争论使联共(布)领导人决定把中国问题作为积极分子会议的中心议题。在积极分子会议的第一天，尼·伊·布哈林作了主要报告。<sup>1</sup> 辩论中，也让反对派的代表卡·拉狄克发了言。<sup>2</sup> 显然给他指定的是“挨打的小孩”的角色。

占领上海使苏联的共产党员和虽已政治化、但对重大政策内幕知之甚少的相当多居民阶层欢欣鼓舞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作出了过高评价，这种评价反映在弗·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句中：“……广州的工人军队（指从省会设在广州的广东省出发北伐的国民党军队——原编者注）夺取上海。”这种情绪，就像斯大林的讲话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感染了联共(布)领导人，当然，联共(布)领导人非常清楚，国民革命阵营的情况远不能让人高枕无忧。“广州的军队”不是工人组成的军队，而是雇佣军。在这支军队里，随着被南方人击溃的地方军阀的队伍陆续加入进来，军国主义情绪的影响不断加强，对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区活跃起来的工会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敌意日益加深。莫斯科知道蒋介石的军队对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及农民协会领袖进行镇压的事实。莫斯科非常清楚 1927 年年初出现并且逐渐深化的蒋介石及其大本营同从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组织的政府之间的对立，非常清楚蒋介石和这届政府的首席苏联顾问米·马·鲍罗廷之间的紧张关系。

1927 年 3 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赞许下解除了蒋介石的多个党内高级职务，用意在于继续担任军队总司令一职的蒋介石能按照国民党

党章(和蒋本人的保证)服从鲍罗廷保持着影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sup>3</sup>

反对派领袖大体上也知道这些事实。反对派由于 1926 年底遭受损失以及 1927 年初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在中国的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大大收敛了自己的行动。<sup>4</sup> 1927 年 3 月 18 日卡·拉狄克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演说阐述了这种情势下反对派对中国的政策问题的态度。他认为,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缺乏革命性”,而且“蒋介石的将军们正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所以应该立即展开同他们的斗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应该鼓足勇气和力量,驱逐右派,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必须立即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组建和武装工农的队伍,进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争取独立”(即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布哈林反对这么做——原编者注)和争取革命中的“实际领导权”的斗争。<sup>5</sup> 托洛茨基在 3 月 31 日写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行动方案。托洛茨基硬说群众运动已达到很高水平,说由于在蒋介石军队的指挥人员中资产阶级—地主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威胁,因此迫切需要在中国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托洛茨基看来,此时他认为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机关(几个月之后他又称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的这些苏维埃“将会成为夺取政权的机关或者地方政权的机关、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的机关”。托洛茨基认为,这些苏维埃暂时将在政党联盟的领导下工作,在苏维埃内各党派之间将展开争取城乡下层群众的斗争。他没有直接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认为这一问题在建立苏维埃之后会自行解决。<sup>6</sup>

拉狄克和托洛茨基提出的方针比斯大林和布哈林坚持实行的路线还要“左”,因此,实现的可能性也更小。但是拉狄克和托